

谢国桢与方志学

任芮欣

提 要：谢国桢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和文献学家。他对方志的认识是志书与史书相辅而行。在他看来，方志学的流派可以分为“史法”派和“史实”派；方志学的发展可以分为雏形期、形成期、繁盛期三个阶段。谢国桢对方志的认识决定了他在历史研究中重视对方志的运用，在南明史、清初史、社会经济史、农民战争史研究方面皆有充分体现。

关键词：谢国桢 方志学 以志研史 方志编修 方志评论

谢国桢（1901—1982）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在明清史、学术史、史料学、版本目录学等方面皆有重要贡献。因为方志学与明清史、文献学具有密切关系，谢国桢十分重视对方志的收集和使用。以此视角观之，谢国桢在近现代方志学上应占有一定地位。回顾既有研究，学术界对谢国桢的方志研究或者存而不论，或者语焉不详。虽然《中国地方志词典》收录有“谢国桢”词条，但仅点到为止，并未详尽论述。^① 基于此，本文拟对谢国桢的方志学研究诸方面作一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一 谢国桢对方志的认识

谢国桢对方志的收集十分重视，认识也尤为深刻。在谢国桢的藏书中，地理方志学古籍占有相当数量，主要有《横山志略》《卧象山志》《长白山录》《吴地记》《洪武京城图志》《天童寺志》《光福志》《兰亭志》《竹垞小志》《五亩园小志》《学海堂志》《永嘉郡记》《石湖志略》《金陵琐志》《荆州记》《兰州古今注》《新疆礼俗志》《章谷屯志略》《宁古塔记略》《相城小志》《木渚小志》《鸳鸯湖小志》《长安志》《长安志图》《台湾府志》《回疆通志》《哈密志》《重修常昭合志》等。^② 在其历史著述中，方志的考察和引用更为普遍。因此，对于谢国桢的方志学研究不可忽视和轻视。

方志的性质问题是考察学者对方志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古往今来，前贤今哲对于方志性质的认识众说纷纭。大体言之，主要有3种典型性观点：方志为史书说，以章学诚为代表；方志为地理书说，以戴震、孙星衍为代表；方志为史地书说，以傅振伦、黎锦熙为代表。^③ 清季以来，章学诚受到学界的特别重视，因此方志为史书说具有较大的学术市场。譬如，李泰棻明确主张“志即史”，称“方志者，即地方之志，盖以区别国史也。依诸向例，在中央者谓之史，在地方者谓之志。故志即史，如某省志者即某省史，而某县志者即某县史也”^④。然而，谢国桢虽为历史学家，但并不主张“志即史”，而是认为方志与史书分而不离，二者并非同类但密切联系。他指出：“从古以来历史就是专门的科学，除了志表纪传各体具备的正史和纪事本末、人物传记各种体裁以外，还有与历史相辅而行彼此有牵连关系记载地理风土的书籍，这种书籍也非常繁复，

① 参见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词典》，黄山书社，1986年，第335页。

② 参见谢国桢：《瓜蒂庵藏书总目》，谢小彬、杨璐主编：《谢国桢全集》，北京出版社，2013年，第8册。

③ 参见薛艳伟：《试析顾颉刚对方志学的认识》，《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8期。

④ 李泰棻：《方志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页。

所谓‘旁宗之子，蔚为大国’，于是就有‘方志学’。”^①这种认识既承认了方志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又体现出方志和史书之间的紧密联系。

此外，谢国桢对方志学的流派和历史也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从横向看，谢国桢把方志流派分为史法派和史实派。他认为：“编修方志之学，本有注重史法的，有注重史实的，注重史法若康海、韩邦靖之言，此文家之言也；注重史实者，此质家之言也。”史实类方志注重保存地方历史资料，如“明末元初士人所编著的地方志书，记事务欲求得其详，如明鄞县范氏天一阁所藏的明代志书，都是记载不厌其详的，保存了颇多的历史资料”。史法类方志一开始反对方志过于烦琐，注重精简方志，如明代康海修《武功志》仅3卷，韩邦靖《朝邑志》也只有3卷；其后，有学人专门讲究方志纂修的史法，如章学诚等。^②清代方志学大为发展，从全国性质的《大清一统志》到省、府、州、县，甚至村镇和山水名胜都有志书。就清代而言，方志学也存在史法派和史实派。谢国桢认为，清代编纂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讲求义例义法的，当以章学诚、李兆洛等人的作品为代表；另一派是致力于考据、综辑事实的，当以孙星衍、武亿、董沛等的作品为代表。^③谢国桢对修志流派的划分方法独树一帜，具有重要意义。

从纵向看，谢国桢把方志学史划分为3个阶段：雏形期、形成期、繁盛期。具体言之，从魏晋到隋末是方志学的雏形期，此时期有记载各州郡的地记，如晋王隐《晋书地道记》、晋王范之《交广二州记》、宋张勃《吴地记》等；有记地方政治情况的，如常璩《华阳国志》；有记载地方人物的，如魏苏林《陈留耆旧传》等；有记地方风土的，如卢植《冀州风土记》、宗懔《荆楚岁时记》等。但是总体来看，此时期的志书是零散的记载，记录对象也是个别地方和事情。唐宋时期是方志学的形成期。隋朝出现了图经，唐代出现了全国性质的《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志》。宋代方志更为繁盛，不仅有全国的志书，如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欧阳忞《舆地广记》；也有分述各地志书，如范成大《吴郡志》、周应合景定《建康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等。编纂方法也大为发展，荟萃政治、经济、风俗、物产、人物及地方文献等，容纳众多内容。元明清时期是方志学的繁盛期。元明方志学继续发展，明代的志书编修已推广到省、府、州、县，共有六七百种。但是，明代方志过于芜杂，没有条理。清政府为加强统治，下诏地方修志。这不仅促进方志数量大为发展，也推动方志理论上的成熟，如章学诚对方志理论多有讨论。^④

综上所述，谢国桢对方志学有深刻的认识。在方志性质上，谢国桢主张志书与史书分而不离，相辅相行；在横向上，把方志学分为史法派和史实派；在纵向上，将方志学分为雏形期、形成期、繁盛期3个阶段。

二 以志研史

谢国桢对方志的认识决定了他在史学活动中对方志的重视和运用。他说：“地方志书，内容丰富，为研究史学及历史地理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所以不可否认，地方志书与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⑤可见，谢国桢在历史研究中对方志的态度是“以志研史”。这也是谢国桢方志

① 谢国桢：《瓜蒂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9页。

② 参见谢国桢：《瓜蒂庵文集》，第167页。

③ 参见谢国桢：《史科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3页。

④ 参见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8—298页。

⑤ 谢国桢：《地理方志学概述》，《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

学研究中最重要内容。

第一，方志文献与晚明史研究。晚明史是近代学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领域，谢国桢也先后出版《晚明史籍考》和《南明史》。其中谢国桢就列有相当数量的地理方志文献。这些方志文献多载他书所未有或未详的史料，对明代人物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并不能完全以地方文献视之。

在“明季地方文献人物传记”部分，谢国桢所引志书有《江渚贞烈志》《青门节义录》《越殉义传》《胜朝粤东遗民录》《明季东莞五忠传》《明季潮州忠逸传》《明季滇南遗民录》等。如，“（《青门节义录》）著录诸人，多有他书所未详者，至习见者，若刘中藻、林宰等人，记其行事，颇多异闻，亦足以补南疆逸史等书之缺”^①。在“明季人士所著地方文献”中，谢国桢也列举了众多地理方志书，如《畿辅人物志》《松陵文献》《帝里明代人文略》《嘉禾征献录》《吴门表隐》《海昌五臣殉节遗事》《虞邑先民传》《诸暨贤达传》《东雍耆旧传》。如《松陵文献》“琐事遗闻，多有他书所不载者，直可视为明季稗乘，未可以全以地方文献概之也”^②。在《晚明史籍考》的基础上，谢国桢又撰写了《南明史略》，根据“搜集到的资料，把南明的历史作了简单平实的介绍和评价”^③。其中方志使用也较为普遍，如《米脂县志》《海州志》《费县志》《光州志》《奉化县志》《慈溪县志》《霍邱县志》《清远县志》《揭阳县志》《湖北通志》《云南通志》《甘州府志》等。

第二，方志文献与清初史研究。《清开国史料考》为谢国桢研究清朝历史的重要著作。在研究建州女真史事的资料时，谢国桢指出方志的重要性，称“记辽东之方志，若《辽东志》《全辽志》等类是也”^④，《辽东志》和《全辽志》“传世甚稀”。民国时期北京图书馆也仅存《全辽志》传抄本与嘉靖刻本，并无《辽东志》。《辽东志》为谢国桢在大连参观“满铁”图书馆时所见，为日本前田侯爵藏明刊本。此外，谢国桢列举了关涉辽东史事的其他方志，如《辽海志略》《山海关志》《四镇三关志》《三卫志》等。他说：“清咸丰间，金州隋汝龄九芻纂《辽海志略》一百六十八卷，记辽事颇详，足补《盛京通志》等书之缺。其他若《盛京通志》《吉林通志》《大清一统志》等书，记掌故者若《八旗文经·作者考》，皆可参考。”^⑤

值得注意的是，谢国桢利用方志批驳日本学者为侵略东北捏造的谬论。为侵略中国，日本汉学界大肆宣扬“满洲非中国论”。日本清史学家稻叶君山指出，“明人曾未涉足其地，山川城站，亦多传闻疑似”。谢国桢认为此论为“无稽臆说”，据史料据理驳斥。《辽东志》就是谢国桢使用的重要证据。谢国桢称：“检本书之卷末，则东北满洲之交通经路，粲然具载。其间海西东水陆城站一节，所记自开原以北至哈尔滨附近，更折向东北，循松花、黑龙两江之江岸，下出于鞑靼海峡，所有驿站，一一详列其中。吾人试按此等站名，就今日地名一为考察，则十之六七总可寻得。”“更自开原东北，行经长白山之北，绕松花江之上源，以出于今之延吉，遵豆满江而南，经朝鲜之咸镜南道，将所有驿站一一检查之，更可得十之七八。”^⑥ 谢国桢以方志为关键史料的研究揭露了日本学者的阴谋，证据扎实，观点鲜明。

第三，方志文献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1949年后，谢国桢接受唯物史观的理念，意识到

① 谢国桢编著：《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47页。

② 谢国桢编著：《增订晚明史籍考》，第767—768页。

③ 谢国桢：《南明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33页。

④ 谢国桢：《清开国史料考》，北京出版社，2014年，第30页。

⑤ 谢国桢：《清开国史料考》，第133页。

⑥ 谢国桢：《清开国史料考》，第130页。

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特编撰《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在该书序言中，他指出：“官修之书有着许多隐讳不可靠的地方，那末，要广泛地考究当时的社会情况，就不能不注意野史笔记、私人诗文集和地方志乘，以及各种档案资料了。”^①查之实际，谢国桢特别注意查找方志中的社会经济史料。譬如，在农业生产方面，清《滇海虞横志》对粮食作物落花生的记载，明陈懋仁《泉南杂志》对水果红柑、荔枝的记载，清李调元《东海小志》对大发哈鱼的记述。在手工业生产方面，清《续外冈志》记载有飞花布，嘉靖《徽州府志》《滇海虞横志》《续补全蜀艺文志》有冶矿的记载。在工艺美术方面，《滇南杂志》记有制纱灯。在商品经济方面，《金泽小志》有松江棉花布的贸易；《盘龙镇志》有纺织品的贸易；《清乾隆两淮盐法志》有食盐贸易；《江西省大志》有瓷器贸易；《新安休宁名族志》有商人传记；《沙县志》记有铁矿贸易；《吴江县志》记载有大米的价格及其浮动。在阶级分化方面，《南陆志》《虞谐志》有贫富分化的史料。

第四，方志文献与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国桢对农民战争问题也较为关注，先后编写《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和《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因为农民起义并非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广泛地辐射不同地域。所以，谢国桢在研究中除关注官方文书外，还主张“参以地方志、各家文集、野史笔记”^②，以补官方记载的不足。1957年出版的《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中大量使用方志。关于河北山东地区农民起义情状，康熙《霸州志》、康熙《保定府志》、民国《雄县新志》、光绪《费县志》、咸丰《大名府志》、乾隆《沂州府志》皆有记载。记载东南地区江浙农民起义情况的方志有嘉庆《海州志》、光绪《溧阳县志》。《奉化县志》有浙江农民军记载。关于中南和华南地区湖北、安徽、江西、广东的农民起义状况，《湖北通志》《霍邱县志》、同治《鄱阳志》、同治《赣州府志》、同治《广新府志》、康熙《宁化县志》、民国《泰宁县志》、同治《南昌府志》、光绪《江西通志》、同治《宜春县志》、道光《新会县志》、同治《韶州府志》、光绪《清远县志》有众多记载。记载山陕甘地区农民军状况的方志有光绪《垣曲县志》、康熙《交城县志》、乾隆《商州县志》、道光《兰州府志》。1981年，《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出版。其中清张潮《虞初新志》和郑澍若《虞初续志》详细记载了天启年间吴中的市民暴动；《瑞金县志》和《泉州府志》记载了佃农的反抗斗争；《昆新两县续修合志》记载顺治三年（1646）南湖一带的奴变；光绪《湖北通志》也有奴变的记载；《台湾府志》记载天启年间台湾对海上武装船队的抗争。

总之，谢国桢在历史研究中充分地重视方志史料的运用，与笔记、文集、官方文书相互补充。在南明史、清初史、社会经济史、农民战争史等方面，谢国桢“以志研史”的认识得以充分地体现。

三 修志与论志

谢国桢不仅在历史研究中使用方志，而且还参与方志的编修工作，在古籍研究中注重对方志进行评论。在方志编修方面，“参加过《黑龙江志稿》《河南通志稿》《绥远通志》的编纂”^③。在方志评论方面，谢国桢重视以版本学和史料学为角度评论其利弊得失，多有一针见血之见。

谢国桢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参与河南、黑龙江和绥远的省志编修，在方志编修层面也卓有成效。首先，谢国桢与《河南通志稿·艺文志稿》的编修。民国时期《河南通志》屡修屡停，

① 谢国桢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册，“前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页。

② 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凡例”，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页。

③ 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词典》，第335页。

目前仅存部分铅印稿和大量手稿。1914年和1921年,河南省曾两度修《河南通志》,均无果而终。1934年,河南通志馆并入河南大学,由河南大学校长兼任馆长。工作到抗战开始,《河南通志稿》大部分已经编纂完成。^①谢国桢参与《河南通志稿》的纂修就是此阶段的工作。正如其自述中所言,“1932年承胡适、傅斯年介绍,到南京前中央大学专任讲师。次年该校介绍我到河南大学任教授,我没有去,可是叫我协助他们编《河南通志》”^②。谢国桢所负责的纂修内容为《河南通志稿·艺文志稿》。因《河南通志》最终未能成书,仅有部分内容刊印。《河南通志稿·艺文志稿》也于1942年内部印刷。目前河南大学图书馆藏有河南通志馆纂修的《河南通志稿·艺文志稿》,为民国31年铅印本。^③

其次,谢国桢与《黑龙江志稿·艺文志》的编修。1914年,黑龙江设立通志局,着手收集史料,撰写初稿,但是最后不了了之。1929年,张伯英重新主持编修,1932年脱稿,1933年印刷。因为尚有疏漏之处,就以“志稿”为名而不用“通志稿”。据“刚主所编之艺文”一语可知^④,谢国桢负责分纂《艺文志》。《黑龙江志稿》卷60—62为《艺文志》,包括“书目”和“文征”两部分,附有“金石”。书目收录黑龙江人所著图书;文征收录对黑龙江的记述之书。1992年出版的《黑龙江志稿》,即根据1933年铅印本整理而成。

最后,谢国桢与《绥远通志稿·民族志》的编修。1931年,《绥远通志稿》开始纂修,1937年初稿完成。“当时遵省主席傅作义先生之意,特派荣祥携稿至北平,延请社会名士傅增湘先生审修订稿。”其后,傅增湘聘请多人在原稿的基础上进行修撰组合。^⑤谢国桢参与修撰《绥远通志稿》就是此时期。据自述,抗战时期,谢国桢经傅增湘介绍,“到川帮私营大中银行聊司笔札,并协助傅沅老编纂《绥远通志》”^⑥。谢国桢参与部分为《民族志》。《绥远通志稿》卷50—53为“民族”,主要记载汉族、蒙古族、满族、回族的流变。1940年,谢国桢在《中和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河套民族变迁考》,即编修《民族志》的部分内容。

因为有多次修志的实践,再加上深厚的文献和史学功底,谢国桢钟爱方志评论,并且往往一针见血,颇有见地。譬如,关于《析津志》,谢国桢对作者、版本源流、内容、体例、方法皆有考察和评论,称:“著者长于勾稽史事,能诗善画,泛览群书,兴趣广博。因之,书中涉及的范围很广。”并且,表彰其“注重调查研究”,“对于地理沿革,民情风俗,也极感兴趣”^⑦。此处以谢国桢晚年在江浙访书时的方志为例,略论谢国桢的方志评论。就其特色言,谢国桢注重从版本学和史料学的角度评论方志。

其一,以版本学评论志书。谢国桢所发现的《扬州休园志》为清乾隆壬辰刻本。从版本学来看,“是书为写刻本,刊刻极精,白纸初印”^⑧。在上海图书馆,谢国桢发现《读史方輿纪要》的稿本,评论称:“关于清初后金发迹之事,辽东女真部分,恐触清廷忌讳,颇有删节,惟旧钞本尚存。今上海图书馆所藏之本,俨然俱在,其中批注之语,字迹极为苍老古朴,审为作者亲笔

① 参见刘永之、耿瑞玲编:《河南地方志提要》上册,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1—42页。

② 谢国桢:《谢国桢自述》,《文献》1981年第4期。

③ 参见河南大学图书馆编:《河南大学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河南大学图书馆,1987年,第2页。

④ 参见张伯英为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黑龙江志稿》所作的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页。

⑤ 参见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出版说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⑥ 谢国桢:《谢国桢自述》,《文献》1981年第4期。

⑦ 谢国桢:《瓜蒂庵文集》,第164—165页。

⑧ 谢国桢:《〈扬州休园志〉八卷》,《江浙访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9—30页。

所写,知为这部书的稿本。”^①关于《华阳国志》,谢国桢发现了明嘉靖甲子成都刘大昌刻本。《华阳国志》为研究巴蜀文化的重要典籍,有明张佳胤刻本和刘大昌刻本。“张佳胤刻本流传较为广泛,至于刘大昌刻本则流传较少……今四川图书馆又藏是书,书品尤为洁净,诚为蜀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可以说是海内外仅存的珍本。”^②

其二,以史料学评论志书。在《香泉志》中,谢国桢发现了秦观的佚文。“宋词人秦少游曾游此地,著有《游汤泉记》及咏香泉诗词,载于此志之内,为《淮海集》中所未收,足以补其未备。”^③谢国桢之所以著录《横山志略》,主要是为了展现明中后期太湖一带的纺织业。“由这些村镇志书中,可以考察书自明末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工商业发展的情况,实为研究我国社会经济、民情风俗等的重要资料。”^④谢国桢从《香山小志》窥探到了清代建筑家与地方风俗的关系。“香山一地,自明初以来,多出工艺哲匠,如明初蒯祥、徐杲等大建筑家。在明永乐以迄正统,北京天安门与三大殿等各项大建筑,多出蒯祥、徐杲诸家之手……清康熙初年修建太和殿的老工部侍郎梁久亦为香山镇人。”此外,《鲁班经》也为明代苏州书坊所刻。^⑤《重修贵州通志》由明代江东所修,为日本尊经阁藏明万历丁酉刻本。谢国桢评论道:“是书编制体例,详于建置沿革、政治制度、徭役赋税之事,犹可以存有明一代之旧典,而于贵阳一区宣慰司之设置,西南苗夷各兄弟少数民族及其种类风俗,言之颇为详尽。”^⑥

概而言之,谢国桢有丰富的方志编修活动,先后参与河南、黑龙江、绥远省志的编纂。在方志实践、文献学、历史学的基础上,谢国桢还注重对方志书的评论,对于作者、版本、内容等有独到的认识。

结 语

谢国桢不仅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和文献学家,也是方志学家。然而,对于谢国桢的方志学研究成就,学术界尚无全面论述。通过考察可知,谢国桢对方志学的理论认识较为深刻。在方志的性质问题上,他坚持志书与史书相辅而行。在方志学的流派上,他主张方志学可以分为史法派和史实派;而方志学的发展可以分为雏形期、形成期、繁盛期3个阶段。谢国桢对方志的认识决定了他在史学活动中对方志的重视和运用。在实践层面,他主张“以志研史”,这在他的南明史、清初史、社会经济史、农民战争史等研究方面皆有充分体现。此外,谢国桢还参与河南、黑龙江、绥远等省的方志编修,并且注重以版本学和史料学的视角对方志进行评论。因此,谢国桢无论在理论认识还是实践层面皆对方志有独到的见解,为方志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谢国桢:《〈读史方輿纪要〉一百三十卷》,《江浙访书记》,第92页。

② 谢国桢:《〈华阳国志〉十二卷》,《江浙访书记》,第160—161页。

③ 谢国桢:《〈香泉志〉不分卷》,《江浙访书记》,第35页。

④ 谢国桢:《〈横山志略〉六卷》,《江浙访书记》,第52页。

⑤ 谢国桢:《〈香山小志〉不分卷》,《江浙访书记》,第58页。

⑥ 谢国桢:《〈重修贵州通志〉二十四卷》,《江浙访书记》,第184页。

China Local Records

No. 4, 2019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Local Records Theoretical Debate Between Zhang Xuecheng and Dai Zhen Zhang Yihe (4)

In Qing Dynasty scholar Zhang Xuecheng and Dai Zhen once had a heated debate about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and related issues. The causes of the debate were mostly analyzed by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scholars from the angle of psychology and academic thoughts, while analyses by current scholars also cover factors such as their life experiences and background of the time they lived in. As to the discussions about the division of their school of thoughts, scholars during the early 1980s mostly looked at the debate as that of school of thoughts or academic subjects, but this view has been challenged by the contemporary academic circle. On how to evaluate the views of Zhang and Dai, scholars in earlier period tended to favor Zhang over Dai, while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trend of “rectifying the name of Dai Zhen”.

Kong Shangren's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Thoughts Chen Shilong (15)

In early Qing Dynasty the man of letters Kong Shangren compiled *Pingyang Fu Records* and *Laizhou Fu Records*. During practice of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Kong Shangren formed his own understandings of local records and related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thoughts. In his view, though similar to history in terms of objectives, local records are different from history in terms of forms. As to specific compilation thoughts, he suggested that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should be appropriate in choosing details. The scope of recordings must be strictly controlled within certain regional limits. In terms of subjects and categories design and arrangements, Kong Shangren accepted the horizontal subjects style in the beginning, and tended to use the vertical categories style in later periods. He also created the category of “Warfares”, proposed that women with extraordinary abilities should be recorded in “Virtuous Women”, thus developed the categories of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Xie Guozhen and Local Records Studies Ren Ruixin (21)

Xie Guozhen was a famous Ming and Qing history specialist and philologist. In his view, local

records move ahead along with history. The schools of local records stud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historical methods” school and the “historical facts” school.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records stud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i. e. the embryonic period, the formation period, and the flourishing period. Xie Guozhen’s local records understandings led to his empha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local record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which are amply reflected in his research of Southern Ming history, early Qing history, social economic history, and peasants war history.

Analyzing the Big Data Features of Local Records Resources and Opinions on New Research Areas of Local Records “Computing” Lin Hao (27)

In broader sense, local records resources with rich contents of reference materials are both a reference base and a huge database. Through simple comparison, it is not hard to discover that traditional local records have certain attributes of the Big Data. In view of the Big Data, data become an important resource. The Big Data features of local records resources, if used properly, can not only better integrate local records culture into the powerful current of Big Data of this age, but also bring about new transforma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records research, and even lead research of this academic subject into a completely new “computing” territory.

Drawings Left, History Right—A Re-exploration of the Value of *Henan Records* to Luoyang City Research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Wang Shulin (33)

Henan Records preserved a large amount of original texts in Song Dynasty. It was widely recogniz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 as having fairly high historical value. Through comparative reading and research of its texts and drawings, we can learn that its texts are sound and rigorous, bearing witness to historical references and archeological materials. More importantly, some of the details displayed in the drawings of *Henan Records* reflect the city’s pattern and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of the city, providing new angles for our understandings of Luoyang City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Explorations and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Jiajing Xiong Sheng*

..... Li Jianwu (42)

Jiajing Xiong Sheng was the first set of local records in Xiong County history. It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preserves a lot of precious historical references, and serves as a trailblazer in the history